

詩言志釋

王文生 著



YZLI0890121929

詩言志釋

王文生 著



YZLI0890121929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言志释 / 王文生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2.1

ISBN 978-7-108-03803-6

I. ①诗… II. ④王…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评论—
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613号

责任编辑 朱利国

装帧设计 罗 洪

封面题签 罗 岭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4.875

字 数 110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22.00元

前 言

载于《尚书·尧典》含有“诗言志”的一段文字，记录了舜命夔典乐、夔受命作答的对话。其内容涉及诗的本质、表现和作用等等问题。唐孔颖达说“经典言诗，无先此者”，它被认为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最早文献。

朱自清先生在二十世纪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最早对这一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了《诗言志辨》的名著。他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称“诗言志”是中国文学“开山的纲领”；并对“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等相关的四条诗论的历史发展作出描述；从“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两个方面提供有益的经验。他在研究中，用大量艰苦搜集的材料来说明问题，而不是用西方观点来比附、规范中国文学思想，更为后来研究者树立了良好的样板。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万事开头难，他未能对“诗言志”的内涵作出明确的阐释；也未能对它的历史发展勾勒出清晰的轮廓；甚至没有对它产生的时代作出考证；而这种考证对理解“诗言志”的内涵是不可或缺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先行者有所苛求，而是要踵武

前贤,把对“诗言志”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我因为受到《诗言志辨》的启发,怀抱着种子里含有发展成大树一切潜能的观点,对这个中国原始诗观进行振叶寻根、沿波讨源的探索。发现其中已潜存着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雏形,对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近二十年来,我先后在两岸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六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最近才把它们汇集成这本小书。书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产生的时代考、从“夔不达于礼”证“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产生在以乐教为中心的时代;从乐教内容无“仁”、“义”,再证“诗言志”纲领产生在孔子以前;从“神人以和”证“诗言志”纲领产生在西周中期的公元前九世纪中叶。

二、对“诗言志”内涵的阐释。(1)作为精神活动综合的“诗言志”的“志”,不是以“知”和“意”为中心的理性活动,而是以“情”为主的感情活动。(2)“诗言志”的“言”是表现而不是摹仿。(3)“诗言志”的“和”,是通过听众与作品的应和而产生的美感教育作用。它是抒情文学的价值,也是抒情文学无可取代的社会作用。

三、通过“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比较,有两个发现:(1)发现中西方文学思想的不同体系。“诗言志”纲领的体系,可以“源于情、形于境、成于味”来概括表述。它以人的内在情感作为文学的内容,通

过创造情境结构来使情感得到表现,以情味作为文学的美感和价值。《诗学》以外在行为作为文学的内容,以摹写生活为其创作方法,以认识生活为其社会作用和价值。(2)概括中西方文学思想、文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出一个文学定义:文学是以形象的方式,表现人的感情,描写人的行为,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我认为用这个从文学本身总结出来的文学定义来代替“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人学”等迂阔空洞的定义,是文学思想研究的必然结果。它将有助于对文学传统的正确总结,有助于文学实践的良性发展。

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费了很长的时间,又采取历史考证、理性思辨、作品赏析、比较研究种种方法来写成这部小书,以之作为中国文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顾盼自知,我没有别人那样可以傲然自许的智商;而又绠短汲深,选取这样涵量丰富、影响深远的课题;难免在书中留下不少疏漏、错误之处,还期待着读者、学者的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一、“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产生的时代考 / 1

二、释“志” / 43

三、释“言” / 71

四、释“和” / 96

五、“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 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比较 / 116

一、“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 产生的时代考

一、关于“诗言志”产生的时代的争论

概称为“诗言志”的中国文学思想最早纲领，见于《尚书·尧典》。其文如下：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①

《尚书》，是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部分追述古代帝王言行的著作汇编。上述一段话，出现在《虞书》之中，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诗论。唐

^① 《尚书·尧典》，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孔颖达说：“《舜典》命乐，已道歌诗。经典言诗，无先此者。”^① 朱自清说：“‘诗言志’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② 刘若愚也说：“古代中国的原始主义诗观，结晶于‘诗言志’这句话中。”^③

古今学者，对于“诗言志”是中国最早的诗论，很少提出质疑。但是，对于“诗言志”产生的时代，却聚讼纷纭。这种争论，是与对整个《尚书》的考证连在一起的。溯自汉代，已有《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之争。东晋以后，《古文尚书》已普遍流行。宋代开始，有人怀疑《古文尚书》出自伪作。直至清代，经阎若璩、惠栋、丁晏对《古文尚书》严加考证，学术界才获致一个定论：那含有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是三国末年魏人王肃伪造，由东晋梅赜推行的。那相传由汉伏生口述，经他的学生用当时隶书抄录的二十八篇《今文尚书》，虽说是真本，其原始材料究竟产生在什么时代也是一个问题。包含着“诗言志”的《尧典》，更是争论的焦点。据顾颉刚的考证，《尧典》应是西汉时的作

① 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用的是《古文尚书》的本子，他按照三国末年魏王肃的分法，把《今文尚书·尧典》分为《尧典》、《舜典》两部分。“诗言志”一段话包含在《舜典》之中，故称《舜典》。孔颖达的话见《诗谱序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

②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见《朱自清文集（下）》，页1116。

③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 1975), p. 69.

品。^① 朱自清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② 屈万里认为：“《尧典》是战国时期的作品。”^③ 徐复观说：“它（指《尧典》——引者）可能写定于西周之末，东周之初。”^④ 罗根泽说：“‘诗言志’，我们可以断定是较早的说话，大约周代已经有了。”^⑤ 刘若愚说：“《书经》这一部分（指《尧典》——引者）的年代，是现代学者争论的问题，有些人相信是迟至公元前第二世纪。其中所表现的诗观显然流行于纪元前第四世纪，而且可能更早。”^⑥

关于《尧典》的时代之争，前后相差达千年，虽然，这种争论还没有直接冲击“诗言志”是中国文学思想的最早纲领这个前提。实质上，如果把这部分材料推至战国和汉代，则不仅这个前提本身成了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学思想起源的历史。对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地为之辨。

① 顾颉刚：《从地理上证今本尧典为汉人作》，《禹贡》半月刊2卷5期，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36。

② 朱自清：《经典常谈》，见《朱自清文集》，页1005。

③ 屈万里：《尚书中不可尽信的材料》，见《新时代》1卷3期。

④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中：私立东海大学，1963年），页42—43。

⑤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2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36。

⑥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London, 1975), p. 69.

首先，我认为，“诗言志”虽包含在《尧典》之中，却不能以对《尧典》的考证来概括对“诗言志”这部分材料的考证。前辈学者对《尧典》乃至对整个《尚书》的考证，大都是从古代语言之差异，地名出现之先后，叙述语气之矛盾，或其他典籍述说同一问题之异同来着手的。这些情况，不容赘述。我在这里仅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尚书》中的虞、夏、商、周书中，除了《尚书》中的《盘庚》及《周书》被大家公认为传承下来的原始资料外，其余部分是由后人或根据原始材料或根据口头传说加以整理而写成文字材料的。后人在整理这些材料时，难免渗入他自己那个时代的语言、语气、地名甚至对材料的理解等等。仅仅根据上述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去推断整篇材料产生的时代和它的真实可信程度是很不够的。尤有甚者，即使某篇材料出现某个地名为后代所有，或某种语气为前代所无，或书面文字较上古文字通顺可读，那充其量也只能作为其直接论述的那部分材料的一个论据，而不能据此推断整篇所有材料的时代性和真实性。

其次，我还认为，“诗言志”这段材料托名舜、夔，那个时代既无足够文献也无出土文物可以证明，自然很难使人相信它真是虞舜时期的产品，当是古代原始口头材料由后人整理而成。仅仅根据语气、文字去考证它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只有把它提到一个较广阔的历

史范围内，根据它的内容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情况，以及各种思想形式、文学实践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才能发现时代在它身上刻下的印记，从而较正确地回答“诗言志”究竟产生在什么时代的问题。

二、从“夔不达于礼”证“诗言志”文学思想纲领产生在以乐教为中心的时代

“诗言志”这段话，包括舜命夔掌管音乐以教育子弟，同时说明音乐、诗歌、舞蹈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以及夔受命时的回答。整个材料的内容，都打上了以乐为教育中心的时代的烙印，而不涉及礼教的问题。

以乐为教育中心的时代是和以礼为教育中心的时代有区别的。然而，我们在古代可信的典籍中看到的却常常是礼、乐连在一起。如《论语》一书中，就可以找到下列的例子：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①

子路曰：“如其礼乐，以俟君子。”^②

①②《论语·先进》，见《论语注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以下所引，除特别标明外，均出自本版本，直接注明《××注疏》）。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①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②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③

孔子曰：“乐节礼乐。”^④

以上几条，都是礼、乐并用，而且礼在乐前。这往往给人以错觉，仿佛在作用上礼比乐更重要。在时序上，也是礼在乐先。其实并非如此。礼与乐各有其用，并无轻重之分。它不是我在这里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乐在礼先。与此相适应的，在教育史上，也可以划分出两个时代，即以“乐”为教育中心的时代，和以“礼”为教育中心的时代。而在时间顺序上，也是乐教先于礼教。

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想先从“乐”与“礼”两个字的考证开始。在现已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已不止一次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宪问》。

③④《论语·季氏》。

出现了“乐”字。但尚未发现正式的“礼”字。甲骨文中的“豊”字，虽然与“礼”的发源于祭祀仪式有关，但并不是正式的“礼”字。关于“礼”字，许慎《说文》曾有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①他在解释“豊”字时说：“豊，行礼之器也。”^②并没有把“豊”断定为古“礼”字。只是后来，徐灏在《说文解字注笺》中说：“豊本古礼字。”二十世纪初，当殷墟甲骨于河南安阳发现之后，王国维在《释礼》一文中对“豊本古礼字”更作了详细的说明。对于王国维的说法，徐复观表示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六《释礼》，以甲骨之“癸未卜贞醜豊”之“豊”，即小篆之豊字，“象二玉在器之形”，即许氏所谓“行礼之器”；但礼乃包括祭祀中之整个行为，非仅指行礼之器；故“礼”字乃由豊字发展而来；但“礼”字除了继承“豊”字的原有意义而外，实把祭祀者的行为仪节也加到里面去了。从上引甲骨文的上下文看，很难承认甲骨文的“豊”字，即可等于周初文献出现的“礼”

①② 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第1篇上，第5篇上。

字。故禮字固由豐字而来，但不可以豐为古禮字。因为从豐到禮，中间还须经过一种发展。^①

由于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乐”字，而没有正式出现“禮”字，所以徐复观说：“这已充分说明乐比禮出现得更早。”^②

除了文字考证外，我们还可以根据《礼记·乐记》关于乐与礼的论述，来探讨乐与礼的时序问题。关于《礼记·乐记》，梁沈约曾经说过，取自《公孙尼子》，疑是战国时的本子，但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然而现在的《乐记》在内容上有许多和《荀子·乐论》相同的地方，显然是儒家音乐理论的总结，其基本思想和理论取自战国以前，当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作品。现将其中有论述乐与礼的不同的材料，摘录如下：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③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

①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台中：私立东海大学，1963年），页42—43。

②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台中：私立东海大学，1966年），页1—2。

③ 《礼记·乐记》，见《礼记注疏》，卷39。

也。^①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也。^②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③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④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⑤

上述几则材料，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来说明乐与礼的区别。如从乐与礼之所以产生的动因而言，则有乐内礼外；从乐与礼之不同作用而言，则有乐统同而礼辨异；从乐与礼取法天地的差异言，则有乐同和而礼同节。虽然这些论述不直接涉及乐与礼产生的时序，却对我们探讨乐与礼产生的时代先后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

首先，从乐内礼外来看，孔颖达对这一论点曾作出解释：“乐也者，动于内者也者，但乐从心起，故感动

①③④⑤ 《礼记注疏》，卷37。

② 同上，卷38。

于内。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礼从外生，故发动于外也。”^①这里所说，“感动于内”，是指人们根据内心的活动而抒发感情。所谓“发动于外”，就是根据外在的要求而规范自己的行动。前者属于感情的活动，后者出自理智的要求。所以《礼记·乐记》云：“乐（音岳）者，乐（音洛）也。”^②《礼记·仲尼燕居》载：“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③《荀子·乐论》也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④从人类心理活动的发展顺序来看，自发的感情活动总是先于自觉的理性活动。所以《礼记·乐记》又说：“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⑤孔颖达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者，言乐象于天，天为生物之始。著犹处也，是乐处大始。礼法于地，言礼以禀天，气以成于物。故云礼居成物。”^⑥这个比喻，说明音乐从“大始”（郑玄注：“大始，百物之始主也。”^⑦）始，是从人类活动一开始就有了的，而“礼居成物”，则是后来才有的事。

其次，从乐同礼异的观点来看，礼也必然产生在乐之后。什么是“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按孔颖达的解

①② 《礼记注疏》，卷39。

③ 《礼记·仲尼燕居》，《礼记注疏》，卷50。

④ 《荀子·乐论》，见《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荀子》，卷14。

⑤⑥⑦ 《礼记注疏》，卷37。